

陈恒·主编

格·致·人·文·读·本



史学理论手册

[加] 南希·帕特纳

[英] 萨拉·富特 主编

余伟 何立民 译

Nancy Partner, Sarah Foot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恒·主编

格·致·人·文·读·本

史学理论手册

[加]南希·帕特纳

[英]萨拉·富特 主编

余伟 何立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理论手册/(加)南希·帕特纳
(Nancy Partner), (英)萨拉·富特(Sarah Foot)主
编;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7.7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751-4

I. ①史… II. ①南… ②萨… ③余… ④何… III.
①史学理论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604 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装帧设计 路 静

格致人文读本

史学理论手册

[加]南希·帕特纳 [英]萨拉·富特 主编
余 伟 何立民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6.5
插 页 2
字 数 804,000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751-4/K·200

定价:118.00 元

编辑的话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对“人文”的关注和反思，无论中外和古今，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话题。然而 20 世纪以来，人类往往因掌握了引领时代发展的科学技术而沾沾自喜，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精神活动空间却日趋褊狭。反映在学科教育上，即教育趋向职业化、工具化，无法传递人文关怀、人性之美。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T.科隆曼(Anthony T.Kronman)认为，人文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重提人文学科，再次发掘人文学科的魅力和价值，目的也就在于为久浸于科技文明喧嚣的读者，营造一方“解人文，思自我，通古今，知天下”的精神家园。

当今的人文学科，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史哲的范畴，涵盖了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专业。学者对人文学科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的探讨，使得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更加宏大，研究对象愈发复杂，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近年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方便读者便捷、有效地了解古今中外杰出的研究成果，我们遴选了 20 世纪以来人文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经典著作，汇集为“格致人文读本”，其内容涵盖了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且每一种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专业教科书，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

“心理东西本自同，文明新旧总相宜。”我们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为

广大高等院校师生和爱好中西文化的社会大众,提供开拓视野的路径、思考与批判的平台、点染启迪心灵的气韵,进而在整个社会,尤其在高校中培育深厚的人文精神滋养。

目 录

第一部 根基：关于“过去”知识的理论框架 南希·帕特纳 / 1

现代性与历史学：职业化的学科 / 11

第一章 “科学”转向：发布非理论化真理的历史学家们 迈克尔·本特利 / 12

第二章 经验主义对历史学的多重意涵 卢茨·拉斐尔 / 30

第三章 为历史想象辩护：捍卫人的因素与叙事 杨·范·德·杜森 / 55

第四章 年鉴学派：实在论、方法与时间的各种变数 约瑟夫·滕德勒 / 90

第五章 思想史：从观念到意义 唐纳德·R.凯利 / 112

第六章 社会史：一种新型的历史 布赖恩·刘易斯 / 129

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与历史知识 / 145

第七章 海登·怀特的工作(一)：摹仿、比喻和历史书写 罗伯特·多兰 / 146

第八章 海登·怀特的工作(二)：陌生化叙事 卡勒·皮赫莱宁 / 164

第九章 德里达与解构：挑战语言透明性 罗伯特·M.斯特恩 / 187

第十章 修辞的复归 汉斯·凯尔纳 / 203

第十一章 米歇尔·福柯：历史和文化的无意识 克莱尔·奥法雷尔 / 223

第十二章 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理论与历史 安·里格尼 / 251

第十三章 历史与虚构的边界 安·柯托伊斯、约翰·多克尔 / 277

第二部 应用：历史学的理论密集区 南希·帕特纳 / 305

第十四章 最新社会史：危机与复兴 布赖恩·刘易斯 / 310

第十五章 妇女史/女性主义史学 朱迪思·P.津瑟 / 329

第十六章 性别(一)：从妇女史到性别史 邦妮·G.史密斯 / 369

第十七章 性别(二):男性要求一部历史 卡伦·哈维 / 391

第十八章 性态与历史 艾米·里克林 / 407

第十九章 精神分析与历史制作 迈克尔·罗珀 / 433

第二十章 新民族叙事 凯文·福斯特 / 454

第二十一章 文化研究与历史 吉尔伯特·B.罗德曼 / 475

第二十二章 记忆:见证、经验、集体记忆 帕特里克·H.赫顿 / 492

第二十三章 后殖民理论与历史 本杰明·扎卡利亚 / 524

第三部 尾声:后—后现代主义:方向与质疑 南希·帕特纳 / 551

第二十四章 后—实证主义实在论:表现之再奠基 约翰·H.扎米托 / 555

第二十五章 历史经验:超越语言学转向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 587

第二十六章 照片:解读历史意象 尤迪特·凯尔巴赫 / 608

第二十七章 数字信息:“让一百朵花儿盛开……”数字是一场文化革命吗?

瓦莱丽·约翰逊、大卫·托马斯 / 634

第二十八章 复原自我:解构之后的能动性 大卫·加里·肖 / 658

第二十九章 应用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和后现代史学的古典源头

南希·帕特纳 / 688

索引 / 706

译后记 / 733

第一部

根基：关于“过去”知识的理论框架

南希·帕特纳*

引言

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是一套严密规整但又有所弹性的框架组织,它支撑 1
着历史知识分析,并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能获得怎样关于过去的知识,确切地说,
即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编排和表达的。这一框架拥有多种概念工具,可用来检验我
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就此意义而言,理论是元史学的(metahistorical):也就是说,它
是作为一种揭示批判性自我意识的辅助活动来进行工作的,而我们作为历史学家
工作时,使用那种意识进行各种假设和实践。理论是元史学的,也在于如下意义:
即按史学理论的最强势定义,它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科、所有时代和各种专门主题。
史学理论的焦点与范围,使得它不同于方法论与技术,也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而更接近于诠释学。在史学史的长时段中,就始于希罗多
德(Herodotus)的那种常规标准而言,理论在这种自省意义上是十分新近的,主要是

* 南希·帕特纳(Nancy Partner),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她的研究兴趣是中世纪历史书写、精神分析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以及以叙事理论和认识论为重心的史学理论。她编有《研究中世纪妇女:性、性别、女性主义》(*Studying Medieval Women: Sex, Gender, Feminism*, 1993)和《书写中世纪史》(*Writing Medieval History*, 2005),在后一本书中,她撰文有《隐藏的自我:精神分析与文本无意识》(*The hidden sel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textual unconscious*)。最近发表的文章包括:《沿着后一后现代边界的语言学转向: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的叙事冲突》(*The linguistic turn along post-postmodern borders: Israeli/Palestinian narrative conflict*),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2009);《叙事持续性:叙事理论的后一后现代生活》(*Narrative persistence: the post-postmodern life of narrative theory*),载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及他人所编《重绘海登·怀特》(*Refiguring Hayden White*, 2009),以及《我们的历史/你们的神话:叙事与民族认同》(*Our history/your myths: narrative and national identity*),载《史学史》(*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012)。她现在正致力于研究叙事构造与欧洲认同这一主题。

20 世纪晚期的产物。史学理论的发展,标志着作为一种智识与文化实践的历史学进入到一个清晰可见的现代成熟期阶段。

2 那些元史学框架是用来检验历史知识的,而我们用于那些框架的术语,往往抹煞了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区别,特别是涉及认识论问题时。但是,在解决重大历史相关事宜的早期方法与理解“历史”确指为何的当代方案之间,有着大量差异。历史哲学,在其众多构想中,试图阐明在漫长时间中人类集体生活的那些宏大变化的形式与方向。其中,著名的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其他古希腊人的周期性循环,各种中世纪基督教千禧年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派的辩证史观。所有事物都潜在地被纳入到这类雄心勃勃的规划中,那些规划试图涵盖并且在智识上规定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文化、政治、战争、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后者被总括在“历史”名下,但“历史”本身除外——换言之,“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我们以这个词确切地意指什么,而且这种知识是如何被编排并以某种固定形式传播的。历史哲学,在其各种版本中,可以是推测性的或分析性的,但是,在其核心,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历史”是设定了的,不可质疑。历史运动在这种宏观式样下被解释,历史学家提供的可接纳解释版本的历史日渐增加,特别是在关于民族、帝国、王权兴衰、经济与文化霸权的长篇历史故事方面。

这类信息以书面形式[塑造“大写历史(History)”的小写历史(histories)]被组织和表达,想当然被认为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关于过去实在的素材。那些材料等着被历史哲学家们组织进各种循环、洪流、对抗性冲突,或者革命性剧变之中。史学理论,与此相反,集中关注“历史”本身,探询:所提供的何种表述确实是关于过去实在的真实信息? 进行描述的术语如何运作? 什么样的操作造就了历时事件的可理解的语言结构,而这些语言结构最终是我们以“历史”一词所实际意指的? 这种在探询焦点与目标上的差别,标志着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差异。

历史作为一门致力于可证实的事实性的学科,为什么会需要理论? 历史要求甚至强令一种额外的理论探讨,那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通过历史究竟意欲何为? 这一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书写”(writing)。在对事实性的集中关注(探查关于过去之精确信息的来源资料,对文献及其他遗物的技术性处理,确立起历史信息相互证明网络,系统阐述并护卫历史学研究的一贯标准)和更大的语言结构(独有它能传达历史学家们在业已确认的事实“中”所见到的各种复杂意义)之间,造就了某种张力,史学理论正是被那种张力所激发出来的。事实标准与语言形式标准不一致造成了张力。当事件被描述或下论断,并且微观历史知识的事实性要经受证实

的时候,事件就成为了事实(或者我们自觉使用的“事实”)。在现代学科中,证实是一套比照支持陈述的证据来评判陈述的程序。在裁定关于过去事实性(发生情况、发生方式、发生时间与地点)的特殊论断的真值状态时所涉及的方法与标准,在其科学志向与理性框架中,是现代的。但是,把各种事实信息聚合体按关系与次序组合在一起——使之可理解和有意义——的那些语言形式,就它们的基本要素而言,的确是古旧的,而且在类型上是“文学的”。

实际上根据定义,历史在形式上是叙事的,因为叙事是一种为了使内涵变得可理解、有意义,便把连续的时间之流操控在其手中的行为;但是,历史知识所必需的各种叙事结构,并不像素朴的事实那样,任凭证实来发落。关于单一事件的各种陈述的语言结构,在规模、复杂性和论证方面,是完全不同于长篇叙事。我们的各种证实程序的认识论力量,最大效果地应用于微观事实,但是,随着历史超出陈述层面,证实会减弱,而且那些把事件意义赋予受控时间段的复杂关系,的确完全不是按同样方式听任证实左右的。那正是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交汇之处:即在诠释、叙事情节、历时事件的复杂完形(configuration)等层面。这些不相称但又相互勾连的形式(陈述 vs. 叙事)引发了仔细审视,而这种审视开辟了通向史学理论的道路。 3

史学理论并非意指“一种历史的理论”,即按照古老的历史哲学类型来解释或预言世界事件进程的某种一元化体系;史学理论不把世界历史运动刻画为兴衰、循环,或者对立统一,它也不着力于那些统辖或限定关于过去之诠释的种种可能性的学科参数。历史这个词,是我们的日常词汇之一,因而我们不断使用“历史”来涵盖一系列重叠的其他观念,范围从全部过去事实到某些类似故事的事情(“他们有段……的历史”),但是,唯有那些恪守当代历史规范的著述,才能作为历史并以某种系统方法来进行分析。因而,发展出史学理论作为其元话语的历史学采用了书写形式,历史学所提供的描述和诠释过去的作品被作为对知识的严肃贡献——历史作品(works of history)而非“历史”,是对真实过去的一种抽象表达。直指书写历史(written history)的史学理论之目标,是对这种历史知识的深度分析,旨在思想明晰和学科自我反思,而且如果史学理论是那种聚集了诸多分析工具的范畴集,那么它要求有一个稳定的、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审视专注于在书写历史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程序与运作——这超出了书写历史的陈述—事实成分层面——并且致力于培养一种对编年结构、因果轨迹、选材与重点、价值负载语言和完全诠释的强烈情感。

由此,史学理论提供了一套框架,支持着我们对历史知识的研究,即那些把过

去之遗迹变成某种具有更大意义——这种意义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的“证据”的诠释活动。史学理论的各种操作概念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而且它因其对象是历史学——全部的书写历史领域——而指向着某种抽象形态,就此意义而言,它即使不是一套体系,它也必定系统性十足。使得史学理论得以冠上“理论”之名的,是其适用度:它专注于关乎所有时空之历史知识的根本要素;因而,它与整个历史涉及面相等。检测史学理论中某个概念是否强而有力,应看其是否有效被使用并且游刃于不同领域和专业、时间与空间。因为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作为以语言为材料的文化制品——别名:历史,以复数形式表示——而被生产出来,理论分析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以及可供历史研究之用的所有社会的各种历史。历史学家用语言建构的复杂公式体系,旨在把观察数据、记忆、关于过去的证据性遗迹、文献和遗物都变成历史——昭告真理的文本。如果历史学打算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那么这种公式体系就要求这种自省的审视。对严格自省的诉求,激发了理论来进行这项自我批判工作。理论,在此意义上,以其最坚实、最清晰的形式直面历史,而历史学家实际所做的,就是藉由书写作品系统阐述他们研究及诠释。

现代性与历史学:职业化的学科

历史学的现代性,肇始于19世纪其进入大学作为一门教授与研究科目。以大学为基地的历史学家,首次成为经过训练掌握不同档案研究技能的专业人士。同时代科学进步所促生的那份热忱与敬意,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驱使着首批研究型历史学家把他们的研究也界定为一门“科学”,并尝试着在科学工作的疆域内为历史索取地盘,即使是边缘的一块。

19世纪的历史学职业化,关注点是调查研究、方法、严密性,以及档案汇编与历史学家依托原始资料对信息所作重述之间的关系。严密而又具批判性的新方法论是历史学的专属自我解释:证实的内/外文本结构,在每一本历史书中都以脚注形式明白地彰显着这种方法。档案研究是历史学基础工作,被添加脚注的书页则是这种档案研究的特有表现。职业历史学认可绝大多数的合格践行者是科学的。正如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指出的:“历史,换言之,成了一种文化上可接受的历史科学;它变得‘技术’了;它学会要求‘训练’;它庆贺它的教授们现在成为‘专家’了。”

在职业化形成阶段,巨大的精力被用于发展精确研究技术,与之相随的是历史学家必须要有强制性训练过程,整个学科被制作可信赖的关于过去之事实信息的

这一核心任务吸引住了。经验主义诸假设——即各种经验方法正确地映照出一个经验世界——似乎没有招致什么问题。新的“科学”重心在于作为一种标准和历史学关键要素的事实性,这往往会令人去关心要有各种程序和查验工序,以求析分出可作为关于过去之断言的那些事实来,那些事实要能经受住其他合格专业人士的批判性核查。查验工序只有合乎某些被全体历史学家所共享并接纳的证实方案才是可行的。档案,特别是政府、财政、外交文件汇编及其他非叙事记录,是职业化研究活动的舞台。

与此前数个世纪博学的非专业人士不同,职业人士将握有着证据优势,在深度与广度上,把最终书写的历史奠定在牢靠的基础之上,以备其他职业人士的批判性审查——即证实。这种证实体制似乎首先让历史与科学结了盟。在这种证实体制中,同样的标准、程序,同样高水准的后天习得技术性手段(语言、古文字学、文献学、古文书学等等),会被设定为真正的职业历史学家精英们都应拥有的入场凭证。

科学一般被认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奠基于以下这些因素之上:研究方案的可重复的条件,相似研究中心中受过训练的可信赖的研究人员,可公开供专家们批判性审查的研究结果,整个学科对证实、批判的广泛接受,以及在职业杂志上刊发、查验、修正的可供同业互查的结论。这种科学观看起来十分宽泛。有鉴于史料的那种事件细节详尽但又不可化约的本质,以及历史研究最终表现形式始终是叙事,则科学足以容留历史,尽管只是一块边缘地域。方法的严密是一个重大观念,一个通过严格训练被反复灌输的决定性观念。这个观念影响了现今职业历史学家研究与新近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这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足以,至少足以,把历史界定为一门颇有志向的科学,或者类似科学的活动。但是历史学家所接纳的经验主义,在常识意义上等同于无偏颇的客观性,但并非是一种不变的或普适的前提。历史学家的经验主义定义,是基于实证主义关于语言的种种假设。即使在19世纪,它也是面临着修正和怀疑,这些修正和质疑在20世纪加剧了。正如卢茨·拉斐尔(Lutz Raphael)论证的,随着历史与经验主义本身都要经受重新定义,在历史与过去事实性之间的经验主义链条,业已被证明有着极高的争议。

历史学术以其对有关充分举证的新路径及新概念的内在诉求,不断扩展着学
5
科主题域,对其做出主要贡献的,必须包括R.G.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工作。他那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哲学,正如杨·范·德·杜森(Jan van der Dussen)所解释的,寻求把一种可用于历史学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科学定义,与想象及移情行为联系起来。年鉴学派史家,则把可理解的传统编年观念拓展为各种长时段和几乎

觉察不到的“事件”，正如约瑟夫·滕德勒(Joseph Tandler)指出的，前者是“变化之最缓慢运作的引擎；(后者指)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方面的趋势性的、中速的变化”。而思想史进入实践领域，有着丰富的术语演变前史，到20世纪50年代其达至成熟期，并将实践范围从历史学相应主题扩展到哲学、民俗学、宗教信仰、艺术等领域。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注意到，一些显明的词汇(如文化、经验、中世纪、现代)的意义随时间而产生各种变体，对这些变体的关注标志着思想史是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前驱。也许，历史学术的首要主题与观点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社会史促成的。社会史引入了日常生活史、劳工史、非精英群体，或者“自下而上的”历史——这是一种彻底的视角转变。在历史学家协会里，布赖恩·刘易斯(Brian Lewis)描述了战后民主化如何采用学术形式来推动社会史对大众行为及经济学的强调，并把一种隐含着的唯物主义因果律和对计量证据的偏好纳入了进来。

在常识性经验主义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数十年间里，人们依然在无法得出大量事实的地方使用“空间”(place)这一概念，而且继续以非科学的语言工具，来建构关于过去的复杂记述。这一点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被历史学界所喜爱的反修辞的平淡风格，暗示着事实性在这一文学自由地带颇为盛行。虽然古老但仍在使用的习语“写它”(writing it up)把握住了这种态度：即，真正的研究，在其全部要求中，首先是要严格，紧接着，只不过出于人类交流的缘故，才去践行“写它”(用“它”来代表所有的思想、论证、建构模式，所有的“历史”凝练成了一个具有惊人模糊性的代词)。总而言之，无须花费太长时间，历史学家们就认识到物理科学奠基于可计量的数据、可重复的试验和对预测性法则的探求之上，而这些与历史学并不相符；与之相对的是历史学奠基于对编年、特殊事件、非重复性情境、社会及文化特性以及散文结构表达方式的探究之上，这些完全不同于法则、模型或范式。但是，悄悄地放弃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科学”概述，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将依然是一种没有元话语、缺少各种自我反思及自我界定工具的实践。史学理论的发展，标志着历史作为一种智识的、文化的规划，进入其成熟期又一个阶段。

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与历史知识

后现代的“后”，在时间上定位不太清晰，更多地是指一条通向某类全新兴趣的道路；换言之，后现代主义把语言推到了历史学基础要素的首要地位。最终，后现代不仅指一段明确的时间，更是思想进程的一个阶段；显然，科学导向的历史概念

不适用了,理论性的科学语言也就无法应用了。在实验室做受控实验的模式并不是历史学研究所做的,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案并不是去试图一次次按照其他历史学家所用的相同方法,来查看是否他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本质上写作类似的文章和著作。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可扎实的历史著作是对特定时间和情景的全面研究和有说服力的论述,并将激发进一步研究,即围绕着一幅普遍接受的图景,扩展广度、开掘深度、添补细微差异并确定各种变化。这一进程类似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描述的科学进步诸阶段。但是,按某种科学模式得到的可复制结论,并不是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历史知识进步。 6

最重要的是,甚至当历史学家们探求各种原因和模式,却超出了某一时段事件之“物性”(thingness)时,如果它还是历史的话,则它依然是不可简化的。历史并不能简化为抽象的、预言性的描述(原理或法则,范式或模式),而丢弃掉所记录生活的特征细节,社会、文化及政治事件的不可减去的具体成分,以及所有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存在着的有意义的生活碎片。历史论述——形式上是叙事的,其一般看法是表达过去实在的所有特殊性,并在所有的特殊性中且通过(in and through)所有的特殊性来表达过去实在——就是历史(全部历史论述)。“权力导致腐败”,这条被无数时空中从小到大各个层面上的大量历史例证所证明了的结论,当人们说这句话也许是想说某些真实情况,但它并非是在说某些历史事情。某些特定类型的权力,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被特定的人或群体所获得。关于这些特定类型权力的各种历史事件,伴随着针对这种权力的所有深层情境和详尽细节,才是历史,即使从中会凝练出某条腐见来。

历史之证据基础(初始研究/确立事实)最接近于人文学科以外的科学探究,在任何情况下,各种对此的审查和监控的规程,在逻辑上是先于史学研究进行的,或者就在史学研究之中。史学“理论”,在这种更新的意义上,认为这些规程是它的领地。史学理论,在此意义上,直面最复杂程度的历史学——即在历史学中,历史学家用饱含价值的语言,把当下可证实的信息配置于可理解的各种长序列中,而这些序列的各种关系与侧重点使得读者明白内嵌于历时事件中的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是通过把单一序列转化为叙事来揭示存在于(in)但却隐匿于同时发生的与递次发生的每件事情的种种意义。而这种叙事“关乎”某些不只是编织叙事之事件的东西。

哲学家路易斯·O.明克(Louis O.Mink)用“完形理解”(configurational comprehension)这一术语来指代这种情况,这一术语是我们据以组织和把握实在的三种基本理解模式之一。其余两种,在明克不可缺少的分析中,指的是科学的演绎理论模

式(把事情理解为某项公式或法则的例证)以及以哲学为代表的范畴模式(把定义对象纳入范畴中)。这种通过各类复杂设定的具体关系与完形构造来理解世界的模式,绘就了历史与文学,而且这种模式也是赋予在社会组织与文化氛围中的特定人物的世界以某种结构并使那一世界得以理解的一种初始方法。理论分析被吸引到复杂完形这一层面,因为历史学家制作了语言产品并把它视作知识。对超越时间的各种关系所进行的完形构造(作为知识的诸多不可简化的模式之一)从总体上看,就是书写历史。

“语言的文化制品”这一精准的历史观念,是所有后现代取径的前提: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把语言推到了最引人注目之处,并认识到语言在构建和映射现实上的力量。显然,迄今为止,这种强化了的对语言的敬意,并没有减弱或侵蚀历史的认识论地位,或者否认它生产可靠知识的能力,它也没有割断与高度演变的过去事实性以及严格的语言制品之间的指涉关系。所有被认为真正有功于知识(可视作证成的信念)的信息,必须采用言语形式,否则它无法经受证实或系统批判。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历史不得不满足现代历史学科标准,那么作为一种语言之文化制品的历史概念就是稳固的和可理解的了。“文化的”这一术语直接挑明了那些标准:属于我们的,不是希罗多德的甚至吉本(Gibbon)的那些。

远超过其他任何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这种认知的全部意义都带入了历史学科中:历史是由语言——以各种复合型的、意义充盈的公式表示的语言——构成的;这些公式源自于历史学家——作者的活跃心灵,而且并非被动地摹仿世界。“历史”,它的叙事形式及其意义,经常让人觉得是被发现的,但却总是被制作的。这种激进洞见的许多面向已经被怀特以无可比拟的深度与精度进行了探究。历史学家有必要去理解并使用文学批评概念以及各种注释方式,来掌握文献的文本性,建立对叙事乃是被制作的,而非被发现的基础认识,以及领会那种类似“无可避免的”各种历史情节类型的文化起源——这些近乎被普遍接受的实践昭示了怀特著作的深层影响。罗伯特·多兰(Robert Doran)和卡勒·皮赫莱宁(Kalle Pihlainen)的文章,检视了怀特思想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扩展了历史的特有自我界定,使之涵括了比喻性语言、意义之比喻性呈现的各种方法、叙事形式的结构性成分,以及虚构文学与历史所共享的情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在此也被认为是这场由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引发的对经验主义预设所进行的挑战的一个基本部分。德里达的绝大部分思想常常与解构——一种致力于语言意指的概念与诠释学——联系在一起,他的见解往往被认为是艰涩和吊诡的,常常会被误解。

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in)主要通过他对历史能动性、因果性和变化的反思来介绍德里达。古典修辞学——一种基本上从语言概念讨论语言的潮流——因语言学转向而在当代被再度运用,它依然是我们诸多基本概念工具的源泉,用以分析各种层面的表现和最全意义上的论证。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罗列了建构说服性论证的各种程序在其文章最醒目之处,所有这些程序系统地按修辞概念排列,使得历史书写与其修辞工具相匹配。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历史解释的冲击依然是强劲的,尽管复杂费解了些,但可以确信他的贡献几乎完全被吸纳进了历史学家们视若理所当然的各种预设;“权力”(power)这个词,在历史学中的使用,促使福柯的出场。克莱尔·奥法雷尔(Clare O'Farrell)追溯了福柯的生平成就及对历史学的影响。福柯并非一位在研究方法上训练有素的职业历史学家,他把其研究描述为在关注点是哲学的而在材料上则是历史的,力求寻找解决诸多历史问题——比如惩罚和控制、监禁、医学诊断和管理——的各种原创路径。他讨论古代性态的研究影响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展示了身体与性行为如何能够被“解读”为关于等级与各种权力关系的文本。

叙事是历史与虚构作品的共有形式,各种转义修辞塑造着意义,各种修辞技巧施用于说服性论证,主要牵涉历史知识的整个概念体系是以语言为基础,对上述这些情况的强烈关注,意味着历史与虚构作品的差异必须被更仔细地重新拟定。叙事理论系统地检视了种种叙事如何被建构,情节如何被组织,以及因果性或能动性是如何定位的,它同等地体现在虚构作品与历史之中,但是历史学家们恰当地持续关注以期确立一种适于他们论述的真理假说(truth-claim)。因而,正如安·里格尼(Ann Rigney)认识到的,与历史学家们利害攸关的是“它(叙事)在历史知识生产中的功能”。历史和虚构作品的边界与交叉点——安·柯托伊斯(Ann Curthoys)和约翰·多克尔(John Docker)对此核查过——依然是对威胁与不稳定性十分敏感的节点,特别是当长时段历史著述被审视的时候;随着语言学转向触及历史学,各种紧张状态又被加剧。“历史,”柯托伊斯和多克尔评述道,“有着一种双重性格;它既分享了文学形式的世界,同时又是一种寻求获得历史真理的严格智识实践。这种双重性格……也许还是历史狡计的秘密所在,即历史乃是一门发明性的、自我改造的学科……”史学理论的框架,把叙事理论、修辞学、话语分析所提供的各种工具,和语言学转向相关领域整合在一起,以适于继续用一种强制性的真理假说来把历史作为一种语言的文化制品进行分析。

